

中国语境下科学家的“原善”

吕乃基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摘 要:科学家的“原善”是人类经由科学与自然的博弈中形成之“善”,是原本之善、基础之善。原善之“善”可以归结为规则意识、理性、怀疑精神、民主意识等。规则意识是人与自然在有限策略下重复博弈的必要条件,是原善的核心;理性、怀疑精神与民主意识则是原善的充分条件。这样的原浸润了“原初”“原始”的色彩,是一种逼近理想状态的抽象。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科学家的原善面临具有“中国特色”的境遇和挑战,人与自然博弈的学术让位于人际博弈的权术;资源代替知识,成为学术的中心。必须排除强加于科学活动的权力因素,让科学家在与自然的博弈中创造知识。必须清理并撤除强加于科学家的人际博弈及其“规则”,让科学家坚守并提升其原善。

关键词:科学家;原善;博弈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2)03-0023-08

科学活动的根本点就在于人经由理性和实验与自然的博弈。^{[1]16-21}正是在与自然博弈这样特殊的科学活动中,形成了科学家特定的品格。巴尔赞称:“一个沉浸在研究中的科学家是资产阶级美德的楷模。”^{[2]209}科学家的“原善”就是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也就是人类在最简单的活动——与自然的博弈,而且仅仅是在认识过程——中形成的“善”。^①鉴于人类所有复杂的活动最终都建立于对自然的认识活动的基础之上,所以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规范是原本之善、基础之善,即“原善”,科学家之原善是一切善的共同出发点与基础。

一、科学家的“原善”

1. 人与自然的博弈

人类经由科学与自然的博弈,其要义是“重复博弈”“有限策略”。自然作为博弈的一方,相对于博弈的另一方而言,那就是自然之大、之久。之大,对所有的博弈者一视同仁,来者不拒。之久,地老天荒,自然奉陪到底。之大、之久的含义还在于,相应于自然的庞大和久远而言,直至前不久,^②人类与自然的博弈及其影响尚微不足道、无足轻重。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自然“忠贞不渝”。只要与之博弈的一方策略不变,自然也就总是出同一张牌。正是由于这一点,长期以来,在人与自然之间就构成了博弈论中的“重复博弈”。此处的“不渝”“不变”意味着,在每一次个别的当下和局部的博弈中,自然“策略”有限。

作为博弈的另一方,科学在与自然的博弈中有四把通往成功的钥匙。^③首先是在观念上剥夺自然的无限策略,即剥夺自然的神性与人性。^④自然的神性由宗教授予,在宗教改革中收回。“自 16 世纪以来,一种更彻底的《圣经》世界观大大有利于现代科学以及与此相关的世界图景的兴起”。^[3]“信仰一个上帝的思想与把所

收稿日期:2012-06-12

作者简介:吕乃基(1945-),男,上海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与科学系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鉴于技术的情况远为复杂,本文仅涉及科学。

② 近年来,一方面由于先前影响的积淀,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在认识论上的探讨越来越细致深入,觉察到不可能完全剥离个人和社会的因素。因而,博弈的“重复”性在降低,自然的策略也日渐难以捉摸。

③ 生产活动乃至日常生活也涉及人与自然的博弈,但没有这样的“四把钥匙”,因而难以重复,更遑论演进。

④ 20 世纪后,科学家逐步认识到,自然远非机械,纯客观只是理想状态,人与自然在认识上不可分离,人类开始在伦理上“敬畏自然”。但是,这样的认识与伦理取向先要经历近现代的“客观”阶段。

有的现象归结于一套规律之下的科学愿望是类似的。”^{[2]31}至于自然的人性,本来由人所赋予。伽利略通过“第一性”“第二性”,划清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界线。牛顿以其因果决定论取代目的论,进一步置自然于“死地”。自然成为“一个冷、硬、无色、无声的沉死世界,一个量的世界,一个服从机械规律性,可用数学计算的运动的世界。”^[4]

其次,在行动上剥夺自然的无限策略,即行之有效的实验方法。^①实验方法的特点是,条件可控制,即“有限策略”“重复博弈”。达·芬奇发现,“同样的结果总是产生于同样的原因。如果原因消除了,结果也就不可能产生”。^[5]进而,“要把这种试验进行许多次,使得某种偶然情况不至于搅扰或歪曲这个证据。”这正是默顿“诚实性规范”的基础,由“重复”而导向“诚实”。

第三,培根明言,自然“一有机会就会说谎”。需要“猜”自然的策略,这就是假说。假说的关键是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找到个别之上的一般,发现贯穿偶然的必然。假说提出预言,指导下一步实验;由实验结果再修正或验证假说。经过实验与假说的反复比较,自然的策略便渐次为科学家所掌握。

第四,从自然最容易博弈的对手开始,循序渐进,由重复博弈发展到演进博弈。^②在循序渐进之时,科学家发现自然局部场合与环节的策略在整体上一致,既彼此相容,又相互制约;同时,科学家所得出的知识体系必须符合逻辑要求。^③

虽然中国的古圣先贤同样感悟到自然亘古不变的规律,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由于天人合一,自然充满了人性;没有采用实验方法;未从最简单处入手,只能由总体上“感悟”,而这样的宏观感悟无助于脚踏实地的进展。

科学作为人类与自然博弈的主要手段,博弈规则有限稳定,而且博弈链很长,让输方或旁观者能够总结经验,然后与赢方在同一规则下继续博弈。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可能发生重复乃至演进博弈。

当前,科学哲学的一些流派强调科学活动的实践性,即“实践优位”,这一趋势与后现代思潮的“实践转向”相一致。作为以研究科学实践活动为己任的科学哲学理应在揭示科学活动与其他实践活动共同点之时,进而说明其不同之处。重视科学实践活动的特殊对象即自然对实践结果的影响,以及这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对实践主体的影响,揭示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所形成的原善。

2. 科学家的原善之“善”与原善之“原”

欧里庇德斯称:“那些获得了科学知识的人是有福的,他们既不追求平民的烦恼,也不急急忙忙参与不公正的事业,而是沉思那不朽的自然界的永恒的秩序,沉思它是怎样形成,以及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形成的”。^[6]

科学家的原善之“善”可以归结为:规则意识、理性、怀疑精神、民主意识等。这样的原“善”浸润了“原初”“原始”的色彩,只是一种逼近理想状态的抽象。^④

① 关于实验方法的功能已有成熟的研究,此处仅简要陈述。其一,简化对象。如在研究气体行为时,保持某些变量如温度不变,考察压强与体积的关系;或干脆由理想实验剔除某些因素,如空气阻力。此类实验就是典型的限定自然的策略。其二,设置某些特定条件,用于时过境迁者或做出某种预期,或者就是培根所谓的“挑衅”,如强子对撞。其三,用于检验假说。

② 一开始是丈量土地和杠杆,对手的“招数”最少,可重复性最高。只要寥寥数招,便可洞悉对手,那就是欧氏几何与阿基米德力学。然后渐次推进,由电磁理论、化学、生物学,直至基本粒子、生命和意识,以及非线性、复杂性的领域。实证科学始于几何学与力学绝非偶然。同时代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其他民族大多主要面对的是动植物,其策略虽逊于人,也复杂到难以胜数。李约瑟曾提出这样的假设:如果科学起源于中国,一开始就不是力学,可能是电磁学。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③ 本文不涉及“先验”与否。

④ 关于科学家的规范和道德品质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此处仅从与科学活动的“博弈”特点的关系略加梳理。同时,有必要区分科学活动、科学理论、科学家的“原善”。关于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的欠缺和不足,已经有大量研究。学术界揭示了科学活动本身存在的问题,如分析、抽象和还原的方法,以及由此给科学理论带来的同样与生俱来的“原罪”。为了揭示自然的“策略”,必须限定对象,选取自然的一部分,将其从环境中分离出来,以及固定对象;必须简化对象,乃至理想化。然而这些在实际上都不可能,只能在近似的意义上做到这一点。因而,科学家所“发现”的规则与实际发生的过程之间总有差距。有必要区分科学活动和理论与技术活动及其结果,以及人类对科学技术的应用。这里就涉及“双刃剑”问题:科学和技术本身是双刃剑,还是因使用者之故?因而,文中对科学家原善之“原”的分析,不涉及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之“原”。而所谓的“理想状态”,类似于“理想气体”,并无褒贬之意。

作为博弈的核心要素,规则必须超越各方,必须相对稳定、一致。在人与自然的博弈中,自然一身而二任,既作为博弈的一方,又超越各方,以其客观性而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在与自然长期的博弈,尤其在实验时,只要科学家的策略不变,科学家与之博弈的那部分自然的策略亦不变。这样的实践活动自然而然就培养出科学家的规则意识。默顿对科学活动所总结的“诚实性规范”就是基于“重复博弈”,科学精神是“对经由长期的科学技术研究惯例而形成的制度性规则的遵守”。相反,“个案处理”“下不为例”,即“一次性博弈”,可能导致囚徒困境,造成人际间的失信、背叛和人性的堕落。

科学家在与自然的博弈中所形成的规则意识应该成为人类一切活动的共同基础。虽然人与人的博弈较之人与自然的博弈复杂得多,但也应该规则先行,这一点在西方文化中就体现于契约精神与法治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对此同样有所认识,然而不得不承认,中国的规则过于变通。在当今社会,或者无规可循,或者有规不循,以致诚信缺失。

理性的名目繁多,在较为一般的意义上,可以区分出科学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①科学家在与自然的博弈中发现,透过自然形形色色即变化多端的现象,可以揭示出自然的规则,也就是现象背后普遍、不变的本质或规律,这就是科学理性所涉及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前者在于现象与本质二分,存在普遍和必然的规律;后者意味着,可以经由一定程序(其核心是遵循规则),揭示本质,发现规律。

怀疑精神与理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重复博弈,如果是研究者重复自己,就是“不相信自己”,主要目的是发现新的现象、事实和规律;如果是重复他人,则是“不相信他人”,主要目的在于质疑乃至推翻,或许还有更新。无论是重复自己,还是他人,共同之处是“不相信”,即怀疑。在怀疑的背后却是坚定的理性:现象与本质看似二分,实则一致:由现象可以揭示本质,由本质可以解释现象;以及,所有规律彼此间的自治。怀疑精神既指向外部世界,也反身向内。前者再加上由简至繁的“演进博弈”,与梁漱溟“文化三路向”^[7]中西方文化的“意欲向前”有关;后者则关系到西方文化的自我更新。^{[1]19}

由这样的科学活动进一步升华所至的价值理性,其一即知识至上,好奇心、为科学而科学都隶属于此。其二即“意欲向前”,在向外和向内的征程上永不止步。科学家与自然特殊的博弈培育了这样的价值理性,而由此形成的价值理性给予科学家与自然继续博弈的动力。

理性,其中的科学理性是认识的基础,揭示“真”为何物,以遵从事实,遵循规律。所谓“真、善、美”,其中的次序即道出了人与世间万物之真谛。宗教与伦理学亦需洞悉人性,至于艺术,画家需掌握比例,音乐家需明了乐理,雕塑家需懂得解剖。此处的“洞悉”“掌握”“明了”“懂得”,都可归于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则是所有实践活动的共同基础。科学家所信奉的“知识至上”同样是价值理性的基础。^②

自然对与之博弈的对手一视同仁,正是在这样的科学活动中,培育了科学家朴素的民主意识。与之相关的是默顿的“普遍性规范”“公有性规范”。科学家与生(科学生涯)俱来反对一切权威。五四运动同时高举“德先生”“赛先生”的大旗并非偶然。

规则意识是人与自然的博弈中“有限策略”“重复博弈”的必要条件,因而是原善的核心。理性、怀疑精神与民主意识则是原善的充分条件。科学家的原善,因其最原始,因而在历史上是所有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出发点;因其最基本,因而在逻辑上是所有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基础。

康德明言“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正是科学家的原善,架起了这两件东西的桥梁。

然而必须指出,科学家的原善只是一种“原初”之善、“原始”之善。

若是简单地把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的规则不加修正、提炼和引导,直接用到社会的所有场合,就会违背

① 因本文之主旨,此处不涉及技术理性。

② 虽然有“知难”“行难”之争,不过由此也说明了知识的重要性。

人性,必然导致不良甚至恶劣后果。林林总总的后现代思潮进一步论证了这一点。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正因为简单照搬,致使科学家人格蜕变、幼稚化,甚至成为“白痴”。^[8]在狄更斯的笔下,一位地质学家从建筑物上敲取标本。当因此而被拘捕时,他称除了标本之外,他不知道有什么建筑物。类似的事例俯拾皆是。

科学家所信奉的理性只是理性的基础而已,有待于价值理性的选择、整合以及引导。在价值理性中,知识也不可能“至上”。为科学而科学不可取,科学要纳入社会之中。实际上,在“为科学而科学”的响亮口号背后,还有好奇心的驱使,而好奇心要听从人类命运的指引。此外,对待世界不能只有理性。面对自然,同样需要满怀情感。自然的价值不仅在于认识,而且包含伦理与审美。对于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有人称,“如果有一种测量人的内在热情的温度计的话,我们将发现,F·培根内心的温度非常接近零度”。^[9]

在科学研究中形成的朴素的民主意识因其“朴素”而易于变味和受到腐蚀,例如形成学术权威,倚势凌人,干预学术民主和自由;或者迷信权威,拜倒在权威脚下。

原善,只是一种抽象。在自然一方,科学家实际上是与整个自然博弈,不可能割裂其中的某一部分,固定其中的某一环节。即使最简单的博弈——欧氏几何——实际上舍弃了分形。再严密的实验和假说,总有未进入科学家视野的漏网之鱼——无论怎样微不足道,正因为没有考虑进去,其未被耦合的“功能”得以在空间上扩散、在时间中积淀,乃至成为奥吉亚斯牛圈中的牛粪,而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行,其后果难以预料——频频发生的蝴蝶效应,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缘于人与自然博弈的漫长历史上被忽略因素的积淀。自然以其复杂、涌现、协同、突变和蝴蝶效应告诉科学家,在人与自然的博弈中,同样充斥着“无限策略”“一次性博弈”。自然以其退化、枯竭、危机告诫人类,在人与自然之间,必须走向合作博弈。

在人类一方,科学家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在与自然博弈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与他人和自身的博弈,不存在纯粹与自然的博弈。所谓科学家的“原善”,在本体论上不可能;在认识论上只是抽象,在客体与主体层面皆如此;在价值观上不可能中立。不仅如此,在人与世界和自身的博弈中,与自然的博弈是所有博弈中最简单者。后现代语境下的博弈论认为,个人既不相互孤立,又是自主、自足、自我运行的,其决策行为随机应变,并会影响他人的反应和变化。寻找个人最优的机制并非将集体理性最大化强加于个人,而是局中人在考虑他人行为-语境后的自主选择,各个当事人之间具有整体反应。作为社会中的一员,科学家必然受到来自社会的强大制约和引导。

就人与自然双方而言,科学以其越来越突现的实践品格——每一次个别的实践都嵌入于“此时此地此情此境”之中,每一次个别的实践都关系到难以捉摸、各不相同的主体的“身体”(body)——告诉科学家,“重复博弈”只是理想状态,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人与自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说,主客体相互作用——难以区分博弈的双方。

更重要的是,作为善之基础的原善,因其未经雕琢和幼稚,必然受到来自人类全部善恶的制约和选择。其一,社会在科学家的原善基础上“演进”,科学家的原善渐次扩展、提升为社会之善、人类之善,这是人类社会的主流。可以列举作为善的代表的爱因斯坦、鲍林等一长串名单。其二,同样可以列举与恶为伍的一战期间制造毒气的哈伯等一系列名单,他们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其三,原善不受制约地膨胀,各种科学狂人即是写照。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原善与原罪仅一步之遥。不论行善、作恶,还是自我膨胀,均需经由原善发现事实和规律——这是行善的基础,也是作恶和自我膨胀的本钱。在此意义上,这三种类型可以合而为一,共同说明了原善之“原”。

科学家的原善所架起的只是由“灿烂的星空”通往“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的地基。地基尚须培高,原善有待提升,以丰富和完善科学家的人性,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当代中国提供了上述三种类型之外的第四种类型:原善被扭曲和践踏,导致原善本身的堕落。

二、中国语境下科学家的“原善”

毋庸置疑,近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这样的成果无疑建立于优良的科学道德与学风之上。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存在大量甚至严重的学术不端。如果说,在一般(主要指发达国家)语境下,科学家的原善有待提升、丰富和完善,需要纳入更高层次的善,并得到后者的引导;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科学家的原善还要面临具有“中国特色”的境遇和挑战,遭遇来自社会的压力和诱惑,在提升原善之时,首先还需坚守原善。^①

当下中国,若是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工作,收入微薄,基本工资甚少,而绩效工资多与课题、经费、论文、工作量挂钩。经济,是对青年科学工作者的沉重压力。^[10]初次分配为主,二次分配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的调整。然而在当代中国,劳动者最基本的劳动所得所占的比例却每况愈下,二次分配的分量则与时俱进。表现在高校中,课题费、基金、奖励、津贴等名目繁多的收入所占的份额日益凸显,成为少数人越来越重要的收入来源。中国的基尼指数日益扩大,若是考察高校中的基尼指数,或将超过社会的均值。

职称和学位更是必不可少。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现在还要加上是否“海归”,接着是助讲、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在通行的职称系列之外,附加令人眼花缭乱的排位体系。20世纪,设立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333第几层次人才,现在又加上了杰青、千人计划,以及长江学者、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最高级是院士等台阶;并一再加以细化,如名目繁多的精品课程、教学名师、基地、平台,优秀论文、提名奖、优秀成果等等。竞争,乃至恶性竞争,不可避免。如果说职称是“与国际接轨”,对学位的要求就是中国特色了。未来中国的高校,特别是“985”“211”,大概用不着助讲。因为全都是博士,第一级职称就是讲师。

大学的级别同样繁复,首先当然是“两校”,然后有“几加几”(其中的“几”视情况而定),接着有“985”“副部级”,再是“211”之类。设立的平台越多,对下越具有强制性、诱惑性,操作上越具有灵活性,寻租的可能性越大。

规定达到目标的手段,并制定或“诱使”类、或“促逼”类的攀爬规则。^② 国家级课题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环,由此即可牢牢捆绑参赛者。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发表几篇论文,著作是否获奖;学校和科研机构则需要占据多少什么级别的台阶,方可升级,等等。重要的是,目标、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催化效应,一环扣一环。高级平台以低级平台为前提,其本身又构成跃上更高级平台的基础。规则重重叠叠、互相嵌套,形成天罗地网。

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大权在握、拥有资源的“有关部门”。随着国进民退,近来,有关部门握有的资金越来越多。而设立各种称谓、奖项和名目繁多的基地,制定相互套叠、环环相扣的游戏规则,是其实行控制的重要手段。最重要的是,有关部门有权任意调整,并拥有最终解释权。

维特根斯坦曾有河床与河流之说,河床是世界图景,规定河水的流量与流向,河床本身又为河流所冲刷与改变。有关部门设计并挖就了河床,社会所扬起的道德鞭子一再落在河流而不是河床上。河水在扭曲的河床中流动会泛起泡沫——没有价值的知识、不会结果的花,甚至造假的污染和废水。并非没有真正有价值的知识,但在相当程度上被淹没了;并非没有猛士,却实在是凤毛麟角。

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形形色色的“规则”扭曲、压倒、摧毁了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养成的“原善”,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规则意识。人际博弈的紧迫性(填表、申报……)让科学家无暇顾及与自然的博弈,人际博

① 在相当程度上,此类情况是发展中国家在追求赶超的道路上的通病,其典型当是韩国造假的黄禹锡。

② “诱使”类规则为每个台阶明码标价:可以有多少奖励,单位或有配套,以及享受何种待遇等。“促逼”类规则系逆向设定,不登上某个平台者几乎没有任何资源,等于自我边缘化。以此保证游戏者或是高高兴兴、顺顺当当,或是被驱赶和“促逼”,沿着条条歧路的层层台阶攀爬。学校则制定各自的具体政策,如某校规定,教师必须每年有五万元以上的经费,方可带研究生;不带研究生,则工作量不够,然后就是下岗。

弈的立竿见影(项目、经费、称号……)让科学家日渐疏离与自然之间长期的重复博弈。人际博弈中大量存在的潜规则,即博弈中的“无限规则”“一次性博弈”,迫使科学家急功近利,投机取巧。满怀希望走上科研第一线的博士痛心疾首地表示:“这半年让我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科技为什么落后,重点高校踏踏实实做研究的科研工作者太少了,包括什么长江、杰青、千人、跨世纪、百千万。旗子一旦有了,静心做研究的也就少了!”^①面对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科学家的原善是如此之脆弱!

李连达院士将中国当代专家分为六种类型——官员型专家:官学结合,用权力提升学术地位,占有科技资源,享受各种有形无形的优惠,官与学相辅为用,互相促进。社交型专家:无职无权,但有活动能力,长于攻关走后门,四面出击,八面玲珑,争科研项目、经费及各种“平台”“重点”“杰出”等称号。虽不如红顶专家事事抢先,倒也能紧随其后,件件不落。商业型专家:下海经商,或是与商家密切合作,或是产、学、研相结合,致力于科技成果转化成为生产力,转化为产品,但成功者少,溺水者多。埋头苦干型专家:无职无权,既不擅长社交活动、攻关走后门,又反对趋炎附势、阿谀逢迎;既不会自吹自擂、大造声势,又不愿意无所作为。凭本事闯天下,凭爱国热情努力工作。包工头型专家:有权、有钱、有背景、有靠山、有上天入地的本事,能够垄断大量科研项目与巨额经费,然后分包给二级包工头,再转包给三级包工头,最后由第一线的科技人员完成全部工作,成果为包工头所有。此型专家日益增多,有利于形成帮派体系、有形或无形的利益集团。综合型专家:兼具五型之优点,既是埋头苦干、艰苦奋斗的专家,又占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优势;既有重大学术贡献,又能官运亨通或是财源滚滚,是专家中为数不多的成功人士。^[11]这样的“队伍”正在分化之中,不断重新洗牌。久而久之,不顺应者将被边缘化。如果测试高校中的基尼指数,会远高于全社会的均值。更为严重的情况是,劣币驱逐良币,坚守原善者被淘汰出局。

上述状况一言以蔽之曰:本末倒置。

其一,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倒置,致使教师日渐疏离本职工作,投身于课题等,尤其是之前的环节——“跑”上面。

其二,博弈次序倒置。科学,其要义在于人与自然的博弈,在博弈中脱颖而出者获得社会的褒奖。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会发生人际博弈。就科学活动而言,人与自然的博弈为主导,人际博弈为次生。然而由于政府大包大揽,由各种途径过度干预科研,使科研人员将沿着有关部门所设阶梯攀爬视为科研乃至生存的唯一道路。其结果是,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科研,也遮蔽、束缚了研究者的视野,削弱了科研人员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直接联系,割断了彼此之间丰富多样的纽带。狭窄的通道、稀缺的资源导致激烈的人际博弈,人与自然博弈的学术让位于人际博弈的权术。科学本非坦途,而是崎岖之路。但是此“崎岖”乃科学之博弈对手自然所设定,而非人为;是通往人类知识的顶峰,而非中国社会的“人上人”。

其三,在严密的制度设计下,媒体意外地获得了额外的权力。^[12]在以知识为“中轴”的社会,理应“内容为王”。在中国的学术界,却是“媒体为王”,乃至奉西方媒体为王,言必称 *Nature* 和 *Science*。^②

最为致命的倒置——是资源奖励知识,还是知识为了资源?适当的制度和体制以及社会激励是需要的,社会向经鉴别的科学家提供资源,以促进其提供更多优质的知识。^[13]现在的情况却是,在制度的安排下,越来越多的人竞相或不得不挤上“华山一条路”:将获取资金、占领学术“制高点”奉为最高目标。

这是一条险路。为何要让科研人员在边缘线上生存,在扭曲中成长?

知识应与权力、资本鼎足而三,^[14]应成为权力、资本运行的基础,成为知识社会的基础。知识的社会建构,反过来说,就是社会的知识建构。社会正是在建构知识的同时,建构了自身。知识,如果不能冲刷和改变河床,则将其污浊腐蚀并消融河床,最终瓦解权力与资本。

① 参见科学网上谭伟杰的博客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719567>。

② 随着国内学术期刊也被纳入评级之中,这一点似乎正在发生变化。

废除歧路,改造险路,刻不容缓——必须在根本上扭转本末倒置。

唯有社会对于科学家与自然博弈的宽松(并非没有引导),方有纳什所谓的“美丽心灵”,前者是后者的必要(非充分)条件。科学活动本身即养成科学家的原善,要做的首先是撤除强加于科学家的人际博弈及其“规则”。

韩非的《喻老》讲到赵襄主向王子期学习驾车的故事。“赵襄主学御于王子期,俄而与於期逐,三易马而三后。襄主曰:‘子之教我御,术未尽也。’对曰:‘术已尽,用之则过也。凡御之所贵,马体安于车,人心调于马,而后可以进速致远。今君后则欲逮臣,先则恐逮于臣。夫诱道争远,非先则后也,而先后心皆在于臣,上何以调于马,此君之所以后也。’”^[15]王子期一语道破御术之要:凡驾驭马车,要使马感到舒适,人的注意力需集中在马上,才能进速致远。若心思都在比输赢上,哪有心思去注意马呢?

如果说,为了统筹考虑改革方略,在政治领域需要“顶层设计”。那么,在科研领域,在人与自然的博弈中,需要的是“底线设计”——不需要那么多旨在拔高和加剧人际博弈的称号、奖项,需要的是在底线之上的向上开放。也就是说,多元的价值判断,不唯国家奖项为大;多种科研渠道,不挤华山一条路。在客观上削减人际博弈对人与自然博弈的干扰和影响,还后者在科研中在先和主导地位。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在最大程度上,还科学家以原善,进而提升原善。显而易见,由正本清源省下的资金正好用于提高科研人员的待遇。在资源发生如此转移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另一项转移:有关部门权力的转移。改变政府职能,小政府大社会,这一点恰与中国改革的方向相一致。

本文旨在厘清来自当代中国社会导致学术不端的因素,并非免除科研人员的责任。如果说原罪需要时时提及予以警示,那么“原善”则需要得到不断发扬,以抵御来自社会的压力与诱惑。

参考文献:

- [1]吕乃基.自然:西方文化之源——博弈论的视野[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16-21.
- [2][美]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M].林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 [3][荷]R.霍依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M].钱福庭,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21.
- [4][美]爱德文·阿瑟·伯特.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徐向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5][苏]B.B.索柯洛夫.文艺复兴时期哲学概论[M].汤侠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161.
- [6][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陈恒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7.
- [7]卢艳霄,张丛林.梁漱溟“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及其现代价值[J].广西社会科学,2008(4).
- [8][英]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陈休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53-154.
- [9]夏军.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思潮[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172.
- [10]吕乃基.高校中的经济学[EB/OL]. [2012-06-05].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0844&do=blog&id=571453&from=space>.
- [11]李连达,李贻奎.当代专家的类型[EB/OL]. [2012-06-23].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715370&do=blog&id=583955>.
- [12]刘玉仙.正本清源:我们以何种姿态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EB/OL]. [2012-06-06].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64093.
- [13]吴建国.从私有知识到公共知识的建构[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12).
- [14]谢嘉幸.论不可交换价值[J].系统辩证学学报,2004(2).
- [15]韩非子新校注:上册[M].陈奇猷,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454.

“Original Good” of Scientist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LÜ Naiji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Abstract: The “original good” (OG) of scientists, formed in the game process between scientists and nature, is primary and basic, embodying rule consciousness, rationality, skepticism, democratic consciousness, etc. Rule consciousness, the core of OG, is a prerequisite for repeated game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y finite strategy while rationality, skepticism and democratic consciousness are sufficient conditions of OG. Thus, this OG featured by prime’ and primitiveness’ comes to an ideal abstra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OG of scientists faces situations and challenges with the so-calle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which academic activities——games between man and nature——give way to interpersonal trickeries; resources, instead of knowledge, become the core of academic activities. Power imposed on science must be excluded so as to allow scientists to create knowledge in the games between scientists and nature, and the interpersonal trickery games imposed on scientists and their “rules” must be removed in order to allow scientists to adhere to and enhance their OG.

Key words: scientists; original good; game

(责任编辑:江 雯)

(上接第 22 页)

[68]沈清松.解除世界的魔咒——科学对文化的冲击与展望[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4:237-268.

[69]黄瑞雄.波兰尼的科学人性化途径[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22(2):30-37.

[70][美]约翰·布罗克曼.第三种文化[M].吕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序.

[71]老逻辑.第三种文化——人文学者的命运真的就只能躲进象牙塔了吗?[EB/OL].[2012-03-22].<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447/9897/909020.html>.

The Fusion and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Culture and Humane Culture

LI Xingmin

(Association for the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for scientific culture and humane culture, this treatise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changes and developments of opposition, division and conflict in two kinds of culture, and explores how to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advancing towards scientific humanism and towards humanistic scientism is the best way to realize the fusion and integration of two kinds of culture.

Key words: scientific culture (culture of science); humane culture; scientific humanism; humanistic scientism

(责任编辑:江 雯)